

学点中国哲学史

B2

安徽人民出版社

学点中国哲学史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74年·合肥

学 点 中 国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frac{7}{8}$ 字数: 60,000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0

统一书号: 3102·427 定价: 0.19元



毛主席语录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说 明

为配合当前正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为广大工农兵读者研究儒法斗争史提供参考资料，我们将上海《文汇报》于去年十月八日至今年七月十五日陆续刊载的“学点中国哲学史”专栏的文章汇集成册。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热情支持，特致谢意。

目 录

中国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祖师爷——孔丘·····	钟则思(1)
墨家在哲学上是怎样批判儒家的?·····	钟则思(6)
孟轲的唯心主义修养经·····	钟则思(10)
老庄哲学是为奴隶制唱挽歌·····	潘富恩(15)
荀况的“人定胜天”思想·····	李定生(20)
韩非的“法治”思想·····	钟则思(24)
评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郭企元 黄士耀(28)
王充的伐孔刺孟·····	许增兴 李海生(32)
故弄玄虚的魏晋玄学·····	陆金兰 茅森妹 崔继锋(37)
谈曹操的反孔尊法精神·····	李海生(41)
柳宗元的战斗檄文——《封建论》·····	黄士耀(45)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	郭企元(50)
评朱熹的“待人”哲学·····	茅森妹(54)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杀人的软刀子·····	许增兴(59)
李贽怒斥孔孟儒学·····	陆金兰(63)
王夫之批判孔孟的历史倒退论·····	崔继锋(68)
严复的译述《天演论》及其法家观·····	胡 啸(72)
洪秀全领导的反孔斗争·····	阎水金(76)
章太炎早期的反孔尊法思想·····	宋 英 群 松(81)

中国唯心主义

先验论的祖师爷——孔丘

钟 则 思

孔丘是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路线的鼻祖。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丘吹捧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并把他的哲学思想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愚弄人民的精神武器。

孔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出身于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早年当过管理仓库和牛羊的小吏，近晚年时在鲁国做了三个月的掌握刑法的大官，后来则一直奔波于各诸侯国之间，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拼命鼓吹妄图复辟西周奴隶制度的反动政治主张，竭力反对新的封建制的建立。

唯心主义天命观是孔子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他企图恢复奴隶制的反动政治主张的理论根据。在殷周时代的思想领域里，“以天为宗”的天命宗教观处于支配的地位。到了春秋末期，由于奴隶们的起义，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不断地打击和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逐步形成和建立。当时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政治改革家子产、史墨等人，曾反对天命，重视人事，力图对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认为“吉凶由人”，决不是

上天所降的。因此，被视为奴隶制的保护神——“天”，受到了怀疑以至于否定。在这场斗争中，孔丘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竭力宣扬天命论。孔丘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挽救奴隶制度崩溃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为了麻痹奴隶们的革命意志和对付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的活动。孔丘为了论证奴隶制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不可动摇的，竭力将“天”说成是有意志的神，鼓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天”所主宰和支配的，上帝的意志即“天命”，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天”如果没有要废弃奴隶制的“道”（政治制度）的话，那么，任何力量也是奈何它不得的。孔丘自称是最能“知天命”者，俨然以执行天命的“大圣人”自居，宣称凡是他所厌恶的事，天也必定是厌恶的，借以证明他所搞的复辟奴隶制的活动，完全是符合“天命”的，而把反对恢复奴隶制，力图革新新兴地主阶级的人物说成是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小人”。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孔丘宣扬天命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他把人的生死祸福和富贵贫贱都说成是天安排的，并用“天（上帝）”来恐吓人们：如果谁触犯或得罪了天，那么他的祈求、祷告都是没有用处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因此，孔丘提出“三畏”：“畏天命，畏大人（当权的统治者），畏圣人之言”。这样孔丘就使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和伦理道德披上了天命的权威的外衣，妄图使人民屈从于“天命”，安于受奴役的地位，不敢有“狎（轻蔑）大人”和“侮（辱）圣人之言”的反抗行动。孔丘就是疯狂地用这种天命论来挽救奴隶制崩溃的命运。

孔丘从这种唯心主义天命论出发，还提出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史观，认为统治阶级的圣人是从天上降

下来的，他们的知识也是天所赋予的。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这就是说“圣人”的知识才能是天生的、最上等的，是通过“默而识之”（主观主义的思辨）而获得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来的。他诬蔑劳动人民是天生愚笨、惰性十足的，认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统治阶级之为“上知”与劳动人民之为“下愚”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为了使劳动人民听任统治者的任意摆布，孔丘还胡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反动的愚民政策，完全是为巩固奴隶主反动统治服务的。

孔丘又大叫“才难”，认为天生之才是很难得的，罕见的，并说这些“天才”一出现就能使“天下治”。他认为在虞舜的时代，由于出现了五个“天才”人物，就使天下太平，而在西周所以出现如此空前盛世时代，则是由于一连降了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等十个“天才”人物，其中有一个是“妇人”（据说是后妃一类人物）；他认为“妇人”应同“小人”并列，微不足道，必须排除在外，所以西周时足以治理天下的天才仅“九人而已”。这就是说历史就是少数“天才”人物所创造的。孔丘在鼓吹这种反动天才史观的同时，还自吹自擂地说：“天生德于予。”他吹嘘自己是一个天生有道德才智的人。他的学生子贡也吹捧他是天生的全智多能的大圣人。孔丘之所以这样自我吹嘘，是有其野心的。他自己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就是说，如果由他执政，他将充当奴隶主阶级的“救世主”，挽救奴隶制度“礼崩乐坏”的局面。这正充分暴露了孔丘鼓吹的唯心主义天才观的反动政治目的。为此，孔丘提出了“复礼”——恢复奴隶制度的一套反动政治主张，其理论基础也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这是说人们皆以“礼”来约

束自己，从而全面地恢复奴隶主阶级的“礼”，这就是“仁”；而“仁”这种政治道德观念是先天存在于人身上的，只要通过内心修养，就可以获得，就能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甚至为着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而“杀身以成仁”。也就是说，只有这样做，奴隶制的“礼”才能得以巩固。

孔丘的唯心主义天才观，也贯穿于他的教育思想之中。孔丘办学校，其所谓“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乃是专门培养为挽救没落奴隶主阶级效劳的人才。他的教学内容不过是“诗、书、礼、乐”，“文、行、忠、信”，即殷周奴隶社会的政治典章制度和道德思想。他认为只要学习了这些东西，就能一通百通，甚至可以预知百世以后的事情。孔丘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向古代“圣人”学习先验的、天生的“知识”，要学生们进行“内省”、“内自省”，即通过内心的修养，用主观主义的思辨方法去获得先天的知识。当他的学生樊迟请教他如何种田时，他就大骂樊迟是“小人”。可见，他是竭力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和实践的，谁要接触外界的事物，便被斥为“道听涂说”，认为这是有损害人的德性的事情（“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同时，孔丘所谓“循循善诱”，就是要把他的学生们的思想纳入旧奴隶制的“礼”的轨道，使他们在视、听、言、动方面都严格地符合“礼”的规定。这样，孔丘教出来的“贤人”、“弟子”，不过是一批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忠实奴才而已。无怪乎当时有一个老农把他们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徒，而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跖则把孔丘及其弟子一概斥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

孔丘所鼓吹的天命、天才和天赋这一套唯心主义的先验

论，一直被后来反动的剥削阶级人物所继承。从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和明代的王阳明以至近、现代的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等反动家伙，没有一个不是宣扬孔丘的天命、天才观的，他们都妄图借助孔丘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如陈独秀、王明、刘少奇则借孔丘的亡灵来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大谈特谈什么“天赋之才”、几百年出一个“天才”，从孔孟那里拣来唯心主义的天才观炮制反党理论纲领，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活动。这真是孔丘的阴魂不散！

墨家在哲学上是怎样批判儒家的？

钟 则 思

春秋战国时代，在哲学上，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参加了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论战。在斗争中，墨家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在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生卒年说法不一,大约公元前四七八到三九二年)名翟,鲁国人,出身于贱人阶级(可能是手工艺者),能制造机械,曾经同他的弟子们帮助宋国防御楚国的进攻。墨子虽曾跟鲁国的儒者学习过,结果却是儒家的反对派,是战国初期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思想家。他反对孔子的“正名分”和崇奉“天命”的反动理论,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进步主张,认为社会的等级“名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官”与“民”,“贵”与“贱”的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对那些认为社会等级是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实际上,这也是对孔子企图恢复奴隶主宗法等级制的反动主张的否定。

墨子针对孔子的天命论,提出“非命”的观点,认为人们的强弱、贫富和饥饱并不是“天命”所规定的,社会的治或乱也不是“天命”所安排的。由于墨子是一个代表小生产者阶层利益的思想家,而小生产者是“劳力者”,他们是靠自己的“劳力”去求得社会生存和政治地位的。因此,墨子特

别强调“力”而否定“命”。他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又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饱，不强必饥”。在他看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只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能改变自己的贫贱和饥辱的状况，社会也会由此而转“乱”为“治”。他认为“天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反动统治者为了愚弄人民捏造出来的。因此，墨子说：“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这就是说，要为社会兴利除害，对于鼓吹天命的反动言论，必须竭力加以批评。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而“君子”只有相信“天命”才能成为“仁者”。墨子则与孔子相反，认为鼓吹“天命”的言论，“非仁者之言也”，如果不竭力否定“天命”，就不成为“仁义者”。这正表明了孔墨之间在思想上是根本对立的。

在认识论方面，墨子反对孔子的“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提出“名”（概念）是“取”之于身外之“实”（客观实在）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认为“名”是“实”的反映。例如，人们关于“黑”“白”的概念就是客观存在着的具体事物的黑白颜色的反映。所以，他认为一切知识皆来自“耳目之实”，是人们通过耳闻目见，反映身外现实的结果。墨子在认识论方面还提出“三表法”，即是他的认识方法的三条准则：第一条准则，以过去历史的经验为衡量知识的真伪是非的标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第二条准则，以广大群众的耳闻目见作为真理的标准（“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条准则，是从社会政治方面的效果来检验知识的正确与否（“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的“三表”思想，基本上是属于唯物主义路线的。当时在剥削阶级统治

下，人民总是被鄙视的，孔子就是以“民”为“下愚”的，而墨子却提出这种相反的观点，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墨子还从小生产者阶层的利益出发，反对孔子的所谓“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观点。他认为人们的智或愚的区别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正如布帛“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一样，决定着人们的智愚品质。墨子进而揭穿孔子所谓统治阶级必为“上智”的骗局，他尖锐地提出责问：“王公大人……焉故必智哉？”认为“王公大人”们并不一定都是有智慧的，他们的富贵特权并不是凭着有智慧而取得，而只是靠贵族的“骨肉之亲”的血统关系而获得的，他们只是在外表上修饰得漂亮一点儿罢了。相反，墨子认为那些出身卑贱的人，倒是很聪明的，并列举了历史传说中著名的有才能的人物，不少是出身于卑贱者来加以说明。墨子这种卑贱者聪明的观点，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步意义。

墨子的学说，对当时新的封建制的建立，在客观上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墨子的学说被他的后继者所继承和发展。后期墨家在反对孔孟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中，发展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他们认为，认识是人的感官接触外物(“遇物”)而摹写外物(“貌物”)的结果。他们进一步提出“以名选实”的思想，比如，画家画老虎，只有画出真老虎的实在样子，才是正确的。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思维活动对于认识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人在感官摹写外界事物的基础上，必须经过“心之察”(思维活动)才能够进一步认识事物的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墨子的狭隘的经验论的缺陷，从而更有力地否定了孔、孟、老、庄等唯心论的先验论。

特别是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上提出“不可偏观”(不可片面

地看待事物)的论点,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他们在反对相对主义和诡辩论,阐述朴素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后期墨家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客观存在。例如,“仗者两而勿偏”,即敌对两方相互依存,没有这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所以说“两而勿偏”。后期墨家这种鲜明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于庄子、惠施及公孙龙的相对主义和形而上学诡辩论也是一场有力的扫荡。

墨家的这种反对“天命”论和先验论的思想,对于当时小生产者阶层为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起了鼓舞作用。但是,墨子错误地认为小生产者阶层要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地位,只要奋发自强就可以了,而不主张用暴力去推翻反动统治者,甚至认为奴隶们“执其兵刃”来进行革命斗争是“天下之害”,幻想统治阶级中出现“与百姓齐事业,均功劳”的有“兼爱”思想的君王和官吏,组成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墨子的这种幻想正表现了当时小生产者阶层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墨子的“兼爱”思想,就是一种“超阶级”的人性论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导致墨子在政治上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这也正是他思想体系中的糟粕部分,是必须批判的。

孟轲的唯心主义修养经

钟 则 思

孟轲(约公元前三八九到前三〇五年),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子思的再传学生,和子思并称思孟学派。孟轲是战国中期没落奴隶主阶级顽固派。在奴隶制政权支离破碎、新的封建社会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把奴隶主的“先王”加以粉饰,追随孔丘,把奴隶制度理想化,并吹嘘自己的话是“君子之言”,制造奸言邪说,扰乱天下,对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实行猖狂反扑,妄图全面复辟奴隶制。

孟轲把奴隶主传统的“天命”与人性合一,给天命思想以道德属性,构成“天”、“心”及“性”三位一体的“天人合一”思想。从而提出一条尽心、知性、知天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

孟轲所说的“心”是“天之所予我者”,即所谓“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辞让之心”(礼)、“是非之心”(智)等“四端”。这个“端”就是萌芽或开始的意思。孟轲认为“四端”的发展,就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他把“仁、义、礼、智”等奴隶制社会秩序和道德,说成是“人皆有之”的天然本性。他举例说,小孩子生来就有敬爱自己的长辈,有“爱其亲”的良知良能;人看到小孩子快要落到井里去,就会立即发出抢救的同情心,以此证明

“仁心”、“善性”，是人固有的良知良能的体现，它不是由客观反映到人的头脑中，而是人的本性所然，即所谓“我固有之”，这是一种赤裸裸地唯心主义的说教。

孟轲特别对子思的“存诚尽性”思想作了发挥。孟轲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道，“诚”又为人心所固有，人把它体现出来就是人道，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因而他进一步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是说，人们只要反身内省，就可以得到“诚”。在他看来，“诚”是天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诚”又为人心所固有，得到“诚”，宇宙万物都是我内心“诚”的外在表现，都为我所掌握。一切在我，我就是一切。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倒行逆施，反对现实，搞复辟活动的理论。

孟轲认为万物都在我的心中，当然认识是“不用外求”了。他宣扬孔丘的“生而知之”思想，说有一种天赋的知识和才能。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是说，人的知识才能不是来源于对外界事物接触，而是天赋的。但是，“良知”、“良能”又不是每人都能保持的，而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只有统治阶级的君子才能保存先天的良知良能，并把他发展成为“圣人”，成为“先知先觉者”。一般的人不能保持良知良能，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展为“圣人”的问题。孟轲搬用奴隶主阶级的话自负说，这种先知先觉的大人君子的使命，就是觉后知后觉者，这样的人是谁呢？“非予觉之而谁也”，就是他孟轲。根据什么去启发被统治者呢？“予将以斯道觉斯民”，即用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社会规范去觉。因此，孟轲把奴隶制加以粉饰美化，游说诸侯，妄图复辟奴隶主阶级的统